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二辑）

La solidarité

连锁论

[法] 查理·季特 (Charles Gide) 著 彭师勤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二辑）

La solidarité

连锁论

〔法〕查理·季特（Charles Gide）著·彭师勤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锁论/(法)季特著;彭师勤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66-1

I. ①连… II. ①季…②彭… III. ①傅立叶, C. (1772~1837) — 合作经济 — 思想评论 IV. ①F09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820号

连锁论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7.12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66-1/F.362

定价: 80.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法〕查理・季特（Charles Gide）著 彭師勤 譯

連鎖論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壽序

自我國有合作運動以來，出版界之合作書籍，已不可謂少，但大都非失之簡略，即已嫌過舊，欲求能適合目前一般合作教育之需要，可作爲標準教材者，僅寥寥數種而已。本院有鑒於此，故於開辦之時，即以供給此項需要爲本院職責之一，因特擬具科目，分別邀請專家從事編著，雖因力求速效，付印倉猝，掛漏之處，未能全免，然於立論之力求公允，組織之較有系統，材料之較爲新穎，觀察之比較周密而切實，則差足自信，而可告無罪於讀者也。

本叢書分四大部分：一、原理之部，連鎖論及合作原論兩書屬之；二、經營之部，農業合作經營論、農業倉庫經營論、農業金融論、交易合作經營論、工業合作經營論、保險合作經營論及合作會計學等七書屬之；三、歷史之部，世界合作運動史及中國合作運動史兩書屬之；四、問題之部，則由各專家分別發表意見，彙爲一書，而總稱之曰中國合作問題。

現在我國合作思想，頗形紛歧，思想紛歧，斯政策亦難一致，此於我國合作運動之合理發展，爲害匪淺。考其原因，雖或由於合作教育之凌亂分散而無一定制度，要亦合作教育之缺乏標準，有以

致之。今後各省合作教育，如能概以本叢書爲教本，則於合作思想之調整，當能有其裨益，此雖近於奢望，亦所以爲我國合作前途計也。

本書作者季特氏爲法國合作經濟學泰斗，其原著早已膾炙人口。彭師勤先生久從季特氏遊，對於季特之著作，每能融會貫通，明晰入微，故不獨譯筆文雅，卽於信達二字，亦非他人所可幾及，誠本叢書之光也。

關於本叢書之編輯，承本院教授王世穎先生共同計劃，得力甚多，特此一併誌謝。

壽勉成於合作學院 二五、十、卅一。

原序

我們這裏印行的連鎖論，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間冬天法蘭西學院一個課程的講義。這是最末一本季特自己改正的講演記錄。那是值得我們特別提起的，因為季特在這本書的校正上，非常謹慎。曾經把他的思想重新用了選擇過的文字表現出來，使我們在全書各處得以從他的幻想的和興奮的句子、典雅的談吐、流暢的文筆內把一個季特絲毫不差地找着。這裏行間，著者整個的爲人，栩栩欲生。經濟學家的季特、倫理學家的季特、社會學家的季特、基督教徒的季特、合作者的季特，在這本連鎖論中，同時呈現于吾人之目前。不管這是一時的巧合，還是有意的結構，這本在他易簣之前數週所校正的書，實是我們一切愛戴他的人之精神的遺囑，即使不談別的，專只這本書，已夠我們對之肅然起敬，尊爲導師。

★

★

★

先從書名講起。連鎖不僅被季特用作一年間講學的題目，而且最初取來加以發揮光大的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個。他的格物致知的熱情和他的長如青年的精神，使之繼續無間地在他的生命

行程上，因經驗的不絕更新，科學地的深入探討，而提出了這偉大的連鎖事實的例證。

連鎖雖然只是一種事實，可是也一樣地得以拿來做成一種學說的基礎。季特就是比較他人更為迫切地感到這種需要的一個。季特是孔德的大同鄉，孔德正是連鎖論的先驅。季特根據孔德的研究，在人類的彼此互相依賴，在人類與其祖先及後代，或與其社會環境的關係中發見了他的理想中的經濟制度的基礎，而自創一個「新學派」以和古典學派即自由學派、舊教學派即權力學派、社會學派即平等學派抗衡。那是一八八九年的事。連鎖主義即於此時誕生。

季特本來是很謙虛的人，正是因為這種過分的謙虛，才有後來的把這個新學說的創始的功績歸之他人，就是在本書中，他還是抱的這種態度。我們當然不是想把雷項布傾亞的成就抹殺，說是連鎖主義的創立與他無關。這個急進黨的大政治家在取連鎖主義以為其政黨綱領的理論基礎時，對於這個主義確有重大的建樹，無從否認他的應得的地位。不過他雖是給了連鎖主義一個法學的解釋——準契約的解釋，雖是使之成為一個通俗的學說，然而他只是連鎖主義的乾爹，並不是連鎖主義的生父。關於這點，我們完全和吳亞里先生同意，他說：「從學說本身言，他（季特）是無可否認地和連鎖主義不能分離。實在說來，他幾乎就是連鎖主義的創始者。」（註一）

無疑的無論從科學方面着眼抑或是從社會運動方面着眼，季特是合作主義的創始人，並且深信永不會有人將來對此提出抗議。合作主義不惟給與了經濟科學以一種新的綱要，而且給與了一種實施的方法，所以合作主義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那創立這種內容如此豐富之主義的第一人，即使沒有他種貢獻，已足使其有無限的光榮。然而我們却不能因季特有了這種光榮，就拋棄他的對於社會學的貢獻，而忘記他是連鎖主義的創始人。

次之，假如我們說季特在連鎖主義中正和他本人沒有二致，也是一樣的錯誤。他把他性格上的表面似乎相反的東西——個人主義者的和社會的兩方面予以調和了。他竟能得到這麼樣的一個奇蹟，使古舊的自由學派的理論和社會主義者的接近。這到底是若干人所有的不可思議的偉力，還是這若干人獨具的天賦呢？（註二）「假如你想更升得高，」他在「新學派」演講中叫道：「升到整個個人所能達到的頂點，而成為最完善，最合于『人』之精義的人時，那你也就不一樣地有權力和詩人一同吟着『Homo sum et nihumani a me alienum puto』，即是說你一樣有一個足以和千萬人的心共鳴的廣大的心」（註三）這裏季特實是給他自己下了一個定義。他說這即所謂隱迷。我們知道這隱迷一字正可以在基督教的辭典中找出。

★ ★ ★
這爲我們所痛悼的先師，既在其深奧的思想，上給我們指出了這麼許多的途徑，已足令我們對這本著作發生一種持久的興趣，何況還有別的理由，叫我們不能不拿來誦讀呢？這雖是爲時已久的沈思，離現在有多少年載了，然而仍舊是再入時也沒有。

原來連鎖主義是有一個奇特的命運的，從學說方面言，雖然似乎有點暗淡起來了，可是在社會範疇內却是到處應用，到處實施。季特自己說得好，目下人類的兩個大顧慮——社會保險和義務教育——都是連鎖主義的嫡嗣。累進所得稅也是一樣。今日大多數國家所推行的改革，正是這種的改革。

我們果真再找得出比連鎖主義更能發生優良影響的哲學學說嗎？我們果真再找得出比連鎖主義更能造福于人羣的學說嗎？

★ ★ ★
現在我們要說的是這本連鎖論在他的法蘭西學院六年講學記錄所印成的著作中佔的是什麼地位。大家都知道這個講座是法國大多數合作社爲得在高等教育界宣傳合作理論而負責

創設的。黎士特先生說這種創意是果敢而聰敏的行爲，（註四）真非過言；這裏的講授記錄所印成的一套書，在現時是合作制度之最完備的科學研究之結晶。

季特在這裏以次研究合作的理論與實際，合作的成就與法則。

先從「大戰中法國的合作組織」、「外國（英俄）的合作運動」、「拉丁國家的合作運動」開始；這雖是對於消費合作運動之一種鳥瞰一類的東西，然而却含有深入的觀察和正確的批評。這一種形式的合作運動，實以他爲其偉大的理論家和虔誠的使徒，除了他以外，還有什麼人更宜于爲之寫成歷史指示前程呢？

但是季特並不是一個有成見的人。他雖是對消費合作組織有所偏愛，然而並不是那種不了解別的方式的合作組織之重要的人，所以他一樣地願意爲我們分析「生產合作」和「農業合作」而有專書問世。

這種客觀的研究，因事實的觀察，跟着把他帶上學理的研究上去。

他的「共產新村與合作組織」本是更不宜于分類的。在這裏我們重新發見了想像家的季特——一位對什麼東西都歡喜留心的季特，他不自禁地爲我們講述一些社會前驅的經驗：那有